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宋教仁



一、走上革命道路

1913年3月20日夜晚，在上海火车站开往南京方向的月台上，猝然响起3声枪响。在枪声中，年青的政治活动家、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宋教仁，一个他的生与死足以影响全国政局的人，倒了下去。第二天，上海《民主报》以“可骇之暗杀案”为题报道了这则举世震惊的消息，随后又用大量篇幅连续揭载了这起谋杀案的全部过程和追捕凶手的详细情形。这3声枪响，带着战争的阴影，很快就飞出上海，飞向全国。

宋教仁，字遁初（亦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4岁开蒙，在私塾读书，因为聪敏颖悟，不久成为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他的家乡山木葱茏（cōng lóng，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水流潺缓，风景十分优美。他从小就萌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他很喜欢地理，可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看。一次，他得到一把上面绘着地图的折扇，高兴得整天带在身边，朝夕展玩，一直到天气凉了下來，已经不用扇子了，他还依然舍不得丢开。

儿童时代的宋教仁表现出对时事，特别是军事活动，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而外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和清政府的处处妥协与黑暗统治，却又早早地在他小小的心灵上投下片片的黑影。每到傍晚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就把同学们召集到村外的草地上去操演军操，做军事游戏。他让那些身体较弱的同学去做“清朝贵族”，自己则带领身体强壮的同学来做平民，双方都在他的安排下互相攻击。结果当然是“清朝贵族”打输了。他就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叫道：“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别同学不明白做这游戏有什么意思，他就给他们解释说：“你看在我们这里的那些清朝贵族多凶，动不动就打人。我们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他们打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该操演起军操，等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好和他们去打。”

12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无力留在私塾里，但他刻苦自学，乡里的人看见这个行止特异的孩子，都表现出很大的惊奇。

17岁的时候，宋教仁的母亲，一个有着朴素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女人，把他送入了桃源县的漳江书院，一所当地最好的学校。这里的山长（即书院的院长）黄彝寿兼任着县学教谕，是长沙人，不仅精于宋学，待人律己都很严格，而且富于民族思想，平常说话虽然不多，但对满清统治者的不满却时常表现在文字之间。他的窗前挂着一幅他亲笔写的对联：“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又在县学大堂上悬挂一幅对联：“堂堂华夏愤膻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湔（jiān）国耻；纳纳乾坤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故，懋育群生。”这里的主讲瞿方梅，除了传授《四书》、《五经》和作八股文以外，还传授经学、小学、舆地、算学、掌故与辞章。他是属于比较开明的“经世致用”派的学者。

宋教仁的敏学好问，又密切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一次，黄先生从长沙运一船书到桃源，在路途中把船碰破了，水渗进来，好不容易才抢救到桃源，但书都被润湿了。黄先生请了几个学生替他检晒，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边晒边看，工作一完，马上就书中的疑义向先生请教。黄先生看出他的资性与抱负与众不同，对他很器重。

这样过了两年，在黄彝寿、瞿方梅两位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宋教仁不

仅获得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且发展了自小就有的朦胧的反清革命思想。1901年，他考取了秀才，但他想的却是怎么样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与同学好友文骏等人登上书院东边的漳江阁。年青的宋教仁纵谈中西政治的得失，关隘的险要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豪情地说：“中国人痛恨满清政权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天下。”巧得很，10年以后，果然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国政权。

1903年，宋教仁22岁。和许多同时代的年青人一样，在获得相当的传统文化教育后，他投身到新式学堂，去寻求更多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知识。通过考试，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这时的宋教仁已经明确了建立反清组织的思想。这年7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兴回国来到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散发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二书，提倡对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会场上引起了顽固派的责难，一场舌战，延续了一整天，黄兴侃侃而谈，见识高超，使全场的听众都为之叹服。黄兴的到来，使宋教仁找到了与之共同战斗的同志。从此，他们相互公开谈论革命，宣传革命思想。但由于他们鼓吹革命的活动过于公开，不久学界当局就驱逐了黄兴，宋教仁也引起清吏的忌恨，有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学监纪钜（p）爱惜他的才华，担心自己无力对他进行庇护，便悄悄地暗示他迅速离去。8月间，宋教仁尚来不及建立他的组织，就离开了武昌，一路匆匆，回到老家桃源。

他回到桃源县城，在下乡回家之前，先去县学拜访老师黄彝寿先生。师生重逢，分外欣喜，但没容他们坐稳，县里的差役送上一份湖北来的公文。黄彝寿拿过来，打开一看，内容是要捉拿桃源乱党“宋敏仁”。挨次行文，经常德府到桃源县，稍许延搁了一点时间，所以刚刚送到。桃源没有“宋敏仁”其人，黄先生知道是宋教仁闯了祸，赶紧让他逃走，叮嘱他千万不可回家，立刻就走。黄先生又在公文上写了“查无此人”4个字，搪塞了之，据说后来黄先生因此被扣去3个月的薪俸。

宋教仁听了老师的话，连家都不回就走了。他从县学后门走出，过河走沅水南岸，经常德、益阳、宁乡一路，到长沙岳麓山隐居起来。这年11月4日，黄兴借庆祝自己30岁生日的名义掩护，召集在长沙的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会。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等人出席了这次聚会。在西区保甲巷彭渊恂家里，他们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第二年的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刘揆一、宋教仁被推举为副会长。宋教仁由此正式走上了推翻清朝封建政权的革命道路。

二、从华兴会到同盟会

华兴会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奋斗目标，计划先在湖南发动起义，让各省随即响应，然后直捣清廷的老巢北京。因此，在华兴会成立后不久，陈天华和姚宏业被派去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名缙，要他到时响应；周维桢和张荣楣去接洽四川会党，使他们与两湖会党合作；杨守仁和章士钊去南京和上海，负责策应一切；宋教仁和胡瑛则奉命赴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在当地的新军队伍里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同志。7月3日，宋教仁、胡瑛与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等人一起，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革命

团体：科学补习所。由吕大森担任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则充当文书。华兴会湖北支部和科学补习所虽然名义上是两个革命团体，但在实际上彼此间人员交叉，协同活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安排就绪以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70岁生日）于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以长沙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湖南新旧各军为主力，把会党作为辅助力量，除联系邻近各省闻讯响应以外，又在省内划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5路，约定同时起义。这次起义的总指挥是黄兴，宋教仁一方面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络，一方面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10月，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桃源发动起义，但由于缺乏思想宣传的基础，起义的经费无从筹措。他想变卖自己的家产，可又限于时间紧迫，一时也没有办法脱手。于是，为避免因为没有经费而导致功败垂成，10月30日，他冒雨从乡下赶到桃源县城，然后又从县城雇了一条小船，急匆匆地赶赴长沙，找黄兴商量这件事。

但这时的长沙城里，起义的消息已经泄露，从10月下旬开始，长沙府、县衙门已在省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并且悬赏缉捕黄兴、刘揆一和宋教仁。不过，这次又将宋教仁写成了“宋敦仁”。长沙城里，革命党人星流云散，刘揆一事先逃走，黄兴也在别人帮助下秘密离开长沙。11月5日，宋教仁来到长沙秘密机关，才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他打算派人回常德去从事破坏活动，以分散清廷的注意，使长沙革命党人的压力减轻，但是苦于没有旅费，无法成行。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帮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潜赴武昌，去追寻黄兴。

到达武昌的当天，正是慈禧的生日，原本预定起义的一天。武昌市表面上歌舞升平，暗地里却杀气腾腾，清兵正在加紧搜捕华兴会会员。宋教仁找到了胡瑛，胡瑛告诉他，黄兴已经离开武昌到了上海，并且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社”作为革命机关，准备再一次举行革命暴动。得知消息后的第二天，宋教仁搭乘日轮“瑞和”号，又匆匆地沿江东下，前往上海。11月21日，他到了上海。但这一次他依然没有追上黄兴，由于受到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革命机关也遭到封闭。困境中的宋教仁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12月13日，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当时革命者聚集的地方。从武昌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在漫长的水上旅程中，他默默地思索了一路。他第一次参加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只有使他在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性的同时，坚定了“欲完我神圣之主义”的决心。宋教仁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从长沙起义的失败中知道中国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搞下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之前，必须大力进行革命宣传，对全国人民进行教育，使人们都能了解进行革命的必要，并为此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都远远超过了老大落后的中国。目睹这一切，宋教仁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但祖国的落后和任人蹂躏，却又激发着他那蓄积在胸中的爱国热情，坚定着他革命救国的决心。一到日本，他就发起组织“20世纪之支那”社，出版《20世纪之支那》，宣传反帝反清思想。他自任总庶务，全面负责这个杂志的组织和联系工作。

脚踏实地的革命活动，机动灵活的组织才能，以及尖锐而又深刻的时论文章，很快就把宋教仁的名声传扬开去。他到东京半年多时间，就已成为中

国留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人物。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重返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首先在东京的中国餐馆凤乐园约见了黄兴，表示愿与黄兴合作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随后又通过程家桢的联系，约宋教仁等人在“20世纪之支那”社纵谈中国的形势与前途，及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7月30日，宋教仁又应孙中山的邀请，前往黑龙会成员内田良平宅，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到会者共有70余人，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和黄兴关于成立新的革命团体的说明之后，全都填写姓名，举手宣誓，加入了同盟会。

在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中，宋教仁是为了顺应革命大势而加入由孙中山所倡导的全国性革命团体的。在华兴会的一次讨论会议上，陈天华主张团体加入，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与其联合，而在精神上仍然保持华兴会的独立。宋教仁则发言认为应该研究入会与不入会的不同以后才能决定，没有明确表态。他之所以持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除了他的性格谨慎以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革命思想与策略上，从一开始就同孙中山并不完全一致。宋教仁不赞成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据此有一些人叫他“二民主义者”。但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和孙中山是一致的，所以他还是随黄兴一起加入了同盟会。不仅如此，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制造革命声势，他又同黄兴、程家桢等人发起了一次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约有1300余人。宋教仁主持了这次大会并致欢迎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演。会场上不断爆发掌声和喝彩声，气氛十分热烈。看到这种情景，连日本友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走上讲台，激动地说：“为中国感到庆慰！为中国感到庆慰！”

一个星期以后，中国同盟会在赤坂区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住宅内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约有100多人前来参加。大会讨论通过了章程草案30条，同意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章程还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负责处理各项具体事务。会上一致推选孙中山担任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协助总理主持本部日常工作。宋教仁担任了司法部检事长。与此同时，《20世纪之支那》也移交给同盟会作机关报，由黄兴代表同盟会，宋教仁代表《20世纪之支那》社，具体办理交接事宜。不久《20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出版，宋教仁依然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驻社办理一切事务。1907年初，又代理同盟会的庶务。由于能力出众，宋教仁一直在同盟会里占据了很重要的领导地位。

三、在艰难的日子里

1906年，宋教仁在积极撰写革命文章的同时，决意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2月1日，他插班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壬班。当时他的日语水平已经高于学校所授的水平程度，从2月起他开始同时学习英语。3月，宋教仁着手翻译《英国制度要览》，成为他作为民国政府制度设计者的开始。

这时，爱情也光顾了这个年青的革命家。他在日本友人西村年一家中结识了他的女儿西村千代子，美丽的千代子深深打动了宋教仁的心弦。一天晚上，他来到西村年一家门口，但他在将要敲门进去的时候，迟疑地停了下来。徘徊良久，最后他鼓足了勇气推门走进去。正巧西村年一不在，动人的千代

子为他开门。这一天，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但宋教仁的爱情没有瞒过他的革命同志，并受到对他期望的同志们的批评。最终，宋教仁为了大局，为了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而牺牲了这次爱情。在日记中，他这样说：“我一时心中大受震动，如劈头冷水，心神皆乱，似愧非愧，似悔非悔，似怨非怨。觉得他们对利害关系的分析实在不错，然而随即想到西村氏的情意，又欲不听之，一时交战于心中，甚为难过。良久，始姑下决心，而听从其言。然而心中仍如火灼，如刀刺，不能片刻忍受。”

这以后，他的身体健康一直不好。4月，上海中国公学的姚剑生为抗议反动势力而投黄浦江自杀，消息传到东京，宋教仁大为哀痛。由于身心两方面的压抑，精神状态很差。深夜，雨声淅沥，孤灯独坐，他觉得有万种凄凉，交集于心。这样的心境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尽最大的力量做好各项工作。

宋教仁在关心国事的同时，一面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一面翻译了大量的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论文，同时还经营《民报》事务，撰写革命文章。过度的劳累，使他的病情转重。但在病中他仍在关注着自己亲爱的祖国的命运。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未及半夜忽醒，而左腋甚痛，我不甚以为虑。良久，忽身体发抖，像疟疾，而且腋痛更加厉害，于是起呼看护妇告之，遂有医生来诊视。又良久，以药与我服，始不发抖，而痛如故。没多久，看护妇、医生都离去，我目不能交睫。这时万籁俱寂，惟有一盏灯惨然立于我的眼前，窗外雨声时滴，我不觉万感交集，想到我罹病在异国的不幸，又想到我前年在武昌生病时也举目无亲，较现在更加愁困几倍，又思考我一身究竟结果如何，我一身结果与我祖国时势的关系如何……朦胧间随口得诗两联：四壁虫声急，孤灯夜雨寒。此身愁里过，故国梦中看。”

这年冬天，湖南革命力量又逐步壮大，全国的革命浪潮逐步高涨，各地反清起义不断。12月18日，宋教仁从报上得知湖南革命军已占领萍醴铁路，高兴得到处找人，询问有无从湖南寄来的信。26日，报上又载萍乡、醴陵、浏阳、湘潭已为革命军占领，长沙也危在旦夕。孙、黄、宋三人频繁碰头，决定由黄兴回广东乘势发动起义。宋教仁非常高兴，到一家体育器械店买了一对铁哑铃，希望通过炼使自己尽快恢复健康。

但反清斗争却又渐渐地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次年2月，黄兴也从广东一事无成地回到日本。随着革命形势的低迷，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裂。作为一个领导人，宋教仁心里很是焦急。他担心中国革命党人步俄国烧炭党人革命失败的后尘，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革命党人尚未涉及的东北地区。他计划在东北发动一场起义，以直接威胁清廷的统治中心北京。2月14日下午，日本友人末永节、古河来访。古河曾在东北“马贼”中干过多年的头目。宋教仁先与他们谈了很久，晚上，由黄兴设宴，商议运动“马贼”起义的事情，最后决定请古河陪一位革命党人先去试探一下，看有无可能。不久，宋教仁又去见了孙中山和黄兴。他打算辞去代理同盟会庶务的职务，专心组织东北起义的事情，但黄兴不同意这个计划。在这次谈话中，黄兴突然说自己要退出同盟会，与之断绝关系。原来，同盟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宋教仁在政治见解上倾向于黄兴，因而对他没有加以劝阻，自己也于第二天上午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孙中山起初不允，经宋教仁再三坚持，只好同意。

宋教仁注意东北“马贼”由来已久。他所以寄希望于“马贼”，是因为

他认为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是 4 万万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压迫和腐败，逼得他们无处可归，他们才不得不走上盗贼的道路。“马贼”的成员其实大多数是穷苦的老百姓，只要对他们申明大义，有把他们变成反清力量的可能。宋教仁曾写过一篇《20 世纪之梁山泊》，说：“马贼何起乎？……满洲人民不堪其虐，乃相与团结屯聚，据寨堡，备器械，习技艺，以为卫身家保妻子之计。其后聚众日多，良莠不一，习为掠财杀人之举者，往往有之。于是满洲官吏指之曰‘会党’，目之曰‘盗贼’，且以其善骑马也，遂以‘马贼’称之”。

当年 4 月，宋教仁偕党人白逾桓由古川清陪同到达辽宁的安东（今丹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在东北，他成功地联系了大孤山等处“马贼”，他给各头目写信，劝勉他们进行革命。同时成功地建立了辽东支部。这年五、六月间，广东黄冈和七女湖起义的消息相继传到东北，宋教仁准备在东北地区立即起事，以示响应。不料白逾桓在碱厂招兵被捕，导致起义流产。宋教仁逃到大连，四处营救没有结果，愤怒之下又潜返吉林，准备伺机再起，不料却意外地撞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大阴谋，即“间岛事件”。

间岛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炮制的企图侵吞中国疆土的阴谋。这件事起于 1907 年 7 月。中国与韩国边境有一块地区，名“间岛”（kantao），一直在中国国界内。18 世纪 60 年代末，韩国北部钟城等郡连闹灾荒，许多农民渡江前来垦荒，每年都向中国越垦局缴纳租金。日、韩两国史籍对此都有明确记载，韩国政府也一向承认这块土地是中国领土。但是，自朝鲜半岛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扩大了领土扩张的野心。他们见中国延边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便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借口没有史籍记载，硬说“间岛”位于韩国一侧，应当属于韩国，其实也就是属于日本。他们还不断扩大“间岛”的范围，竟把延边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 4 县地方，全都归入所谓“间岛”地区之内，从而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边界问题，变成了一个中外瞩目的外交事件。

敏感的宋教仁立刻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迅速从起义失败的阴影里摆脱出来，满怀着爱国热情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他化名贞村，混入制造事端的日本侵略组织“长白山会”，巧妙地摄取了该会所制造的所谓延边地区历来属于韩国的证据，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他又回到东京，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资料，从中、日、韩三国的史籍里，稽引出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这块土地应属于中国无疑。为了起到宣传的作用，他出版了《间岛问题》一书。

当《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日本某些著名学者巧言劝诱宋教仁以高价卖给日本政府，不要帮助自己的仇敌清朝政府。但目光远大的爱国者宋教仁拒绝了这种诱劝。恰在这时，已经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的袁世凯为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电令驻日公使杨枢物色两名吉林省的留学生，前去查明这一地区的情况。杨枢已经知道宋教仁写了《间岛问题》一书，就通过宋教仁的好友覃理鸣索得书稿，给袁世凯拍了一封长达 2000 余字的电报，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袁世凯复电极为赞许，特地赠款 1000 元，同时命令宋教仁立即回国，以便在日本谈判时出席作证。宋教仁说：“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回国？”杨枢对此不敢作主，只好打电话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满口答应奏请慈禧太后，取消通缉令，并且赏给四品京堂，要宋教仁回国任职。

宋教仁就此事会晤了孙中山，在经过孙中山的同意后，决定打入清政府内部进行革命活动，表示愿意回国。可是，当他正在准备束装就道的时候，忽然接到由《民报》社转来的两封在封面上写着“宋京卿启”和“宋京堂启”的信。信中对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一事大加讽刺，大意是说：你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等等。宋教仁阅后，见自己的心思这样不被同志所理解，不禁大哭一场，决计取消回国的打算。他把杨枢硬塞给他的1000元赠款大部分都散给了比较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心安理得地说：“我著此书，是为了中国的一块土地，不是为了几个钱。”又登报申明自己与清政府不可调和的立场。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一边学习，一边革命，知识突飞猛进，思想更加活跃。在这段艰难的时间里，他一步一步从反满的狭小樊篱中解脱出来，向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靠拢。通过这一段艰难岁月的磨练，他又把自己锻炼成为民主革命思想的出色的宣传家和鼓动家，通过《20世纪之支那》、《民报》等重要活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同时，宋教仁还在无数个艰难的长夜里苦苦思索，明确了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

四、渔父大名闻于全国

自“间岛事件”以后，日本政府对宋教仁大为不满，把他看作是清政府派来的密探，对他多方刁难，他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步涣散，革命党人所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则使他感到心情非常压抑。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闭。1909年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重组光复会，公开与同盟会分庭抗礼，革命队伍内部更趋分裂。1910年6月，孙中山化名Alaha医生潜返日本，宋教仁去见孙中山，商量整顿党务问题。但几天以后，日本警察发现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迫使孙中山匆匆离去，使得同盟会整顿工作没有获得任何进展。这年的年底，宋教仁接受了内田良平、北一辉、清藤幸等日本黑龙会成员为他举行盛大送别会。宋教仁抱着在大江南北开展革命运动的决心，离开日本归国，并于1911年1月初回到了他离开6年之久的上海。

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都市，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也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有不少全国闻名的进步报刊，其中规模最大，发行量最多，影响也最广泛的一家，是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早在于右任创办《民呼报》时，他就想请几位撰稿人，正好康宝忠从东京回沪，于右任就请他在同盟会总部中，推荐一位能文善写之士，康宝忠即推荐宋教仁。当时正是间岛问题交涉最困难的时候，康宝忠告诉于右任说：“您试着读一下《间岛问题》这本小册子，就可以知道宋君的学问气度与见识了。”这番话使于右任对宋教仁这个名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教仁回到了上海后，也因为早已慕于右任的大名，遂与谭价人、刘成禺一起主动拜访于右任。在于右任的寓所，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抵掌而谈。当谈及中国外交形势危急的时候，宋教仁侃侃而谈，旁证博引，把列强各国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应取的策略分析得头头是道，居然令一向才气横溢的于右任为之折服。宋教仁又谈及报社的宗旨和倾向，报社的具体工作办法。于右任当即力请宋教仁留下担任《民立报》编撰。宋教仁认为自己是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有些为难地说：“上海危险之邦，恐怕不能久住。”于右

任也是被通缉的“要犯”，回答说：“处境的危险，我与您是同样的。但一定会有保证安全的办法。”宋教仁见于右任这样说，也就慨然地答允了。于是，于右任在法租界三茅阁桥畔另外租了一间屋，作为宋教仁的编纂室。后来《民立报》社房子着火，同事之间互相解嘲，都说是因为宋教仁想搬到租界去的缘故。有一人得联云：“桃源渔父真逃世，一炬居然避祖龙”。《民立报》社的新屋也就因为他才开始营造。

当时上海各界的人士中没有人知道宋教仁这个名字。报社同行称他为“桃先生”，外面寄来的函件也是寄给“桃先生”，写的文章则署名“渔父”。时间长了，认识他的逐渐增多，但也只知道他是《民立报》的渔父先生，不知是大名鼎鼎的宋教仁。“间岛”交涉期间，中国内地报纸有很多激愤的文章，但并不能搞清“间岛”的地理位置。后来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到宋教仁陈书披图，考以历史，亲手绘制地图予以公布以后。当时，全国为之震动，上海的外文报纸也竞相转载。但那时宋教仁署名“宋练”，旁人也不知“宋练”即是渔父。宋教仁主持《民立报》笔政之后，“间岛”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案。这一时期上海的民气很旺，集会结社演说极为盛行。可惜大多数演讲者因为限于知识与依据的缺乏，不能击中要害。于右任于是介绍宋教仁到各处演说。宋教仁在上层人物经常聚集的西园演讲了两次，效果异常的好，只要他登上讲台，听众的情绪一下就会热烈起来。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当时上海名流都向于右任打听演讲人的名字、籍贯，于右任回答说他就是渔父。宋教仁自己也签名为“宋渔父”。从此，宋渔父的大名渐渐传播开去。

中俄界约纠纷发生后，举国激愤，但清政府昏聩，毫无外交策略。宋教仁发愤著《二百年来之俄患史》，将新旧条约逐一研究，发表交涉办法，洋洋数万言。交涉过程中，外文报纸转载俄人要求在撒拉时美驻兵，在库尔札驻领的消息。西报地名的音译，与我国地名全然相异，当时举国报纸，莫能辨明，又是宋教仁引经据典，指明撒拉时美为承化寺，库尔札是伊犁附近的宁远城，俗称金顶寺。一时读者翕然拜服，钦佩他的博学，惊叹无人能与之抗衡。

宋教仁痛斥清政府的昏聩无能，指出那些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无复公忠之义，至于其极，则且不恤营私罔上，学秦桧、严嵩之所为而毫无顾忌”，从而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除了《二百年来之俄患史》，他还在《西方之第二满洲问题》、《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讨俄横议》、《清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以及《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危机，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之所以对中国维持均势主义，绝对不是因为它们热爱中国，实在是因为分割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帝国主义各国是各怀鬼胎的：日本时刻都在想着独吞中国；沙俄在日夜觊觎中国新疆和东北的大片土地；英国想继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并且窥伺云南与西藏，而美国则正在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扩张侵略势力，所以，中国有被瓜分豆剖的危险。宋教仁从当时各国的相互关系来看中国的处境，发出一系列为别人所不及的独到见解，不愧为一个卓有见识的政治家。

对于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宋教仁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深刻尖锐的批判。他专门写了《宪政梦可醒矣》、《中国古宪法复活》和《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等文章。他指出：“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

以实行专制者也。”可谓一针见血，希望人们尽快丢掉对清政府的幻想。

就这样，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共发表了文章80余篇，内容涉及到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宋教仁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以《民立报》为主要阵地，在政治思想领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他以丰富的学识，使人为之耳目一新。

五、建立中部同盟会总会

正当宋教仁在上海积极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的时候，同盟会在香港又一次酝酿举行起义。黄兴和赵声等人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统筹部，准备对广东省城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次他们决定召集各省同盟会同志及敢死之士，编制敢死队，名为选锋，作为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并通知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人同时响应。原计划分10路，后改为4路，先攻占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支军队，由湖南进攻湖北；由赵声率领一支军队，经江西进攻南京，与长江流域各省起义部队会师北伐，直取清朝统治者的巢穴北京。

各地同盟会会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欢欣鼓舞，纷纷赶往香港及广州。宋教仁也接到黄兴、谭人凤的来信邀请。于右任竭力挽留，说：“就大义而言，何敢阻君；就私交而言，实在不愿意君去也。”宋教仁回答：“事情成功，则为4万万同胞造就幸福，失败，则不过送掉我一颗头颅而已。”

他将报馆笔政暂托方潜代理，嘱他著文时仍用渔父名义，以免引起人们怀疑。自己携带一只大皮箱，假装回武汉，悄悄乘轮南下。4月中旬，他到达香港。香港统筹部下设有5个分部，宋教仁到后，接替陈炯明任编制部部长，负责拟订文告、约法，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制度草案，以便在起义胜利后颁布施行。在异常纷扰的环境中，他尽思竭虑，仅仅用了10余天时间，就写成了厚厚的3大本。此后所有的公告、文令也都出于他一人之手。

4月27日，宋教仁与何天炯、陈其美等人乘晚班轮船赴省，准备参加冲锋陷阵的战斗。他们于4月28日凌晨到达广州。但这个时候起义却已经失败，他们在船上只望见火光蔽天，城门紧闭。清军兵痞拥入码头，对过往旅客盘问甚严，他们无法离船上岸，只能返回香港。

这次武装起义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英勇牺牲与被捕就义的革命党人有近百人，许多优秀的同盟会员英勇地捐躯了，其中有宋教仁的好友，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陈铸三。宋教仁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之情，挥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哭铸三尽节黄花岗》：

其一

孤月残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
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
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忠名。
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泪有声。

其二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
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才武穆竟知兵。

卅年片梦成长别，万古千秋得有名。

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

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无论在人力或是在财力，都受到惨重的损失，思想上也遭到重大创伤，不少人对革命的胜利丧失了信心，对革命的前途感到渺茫。不久，赵声愤郁而死，正在英国利物浦留学的杨守仁痛不欲生，投海身亡。负伤而归的黄兴，对残酷屠杀同志的清廷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恨尽切骨，立誓要杀了他们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连一向反对采取暗杀手段的胡汉民也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附议黄兴的主张。

宋教仁与众不同，默默地咬着牙关，和陈其美一起返回上海，仍然主持《民立报》的笔政。他那支锐利的笔，包含了比以前更多的郁郁的愤懑，向人民反复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地呼唤国民担负起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依旧坚韧不拔地从事着革命的联络和组织活动，积极地寻找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7 月，经历了黄花岗起义失败的谭人凤本已心灰意懒，想回湖南老家去休养，不再过问党事，但在武汉受到焦达峰等人的劝阻，又沿江东下上海，和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再次相聚。三人聚会以后，重又鼓足了组织革命力量的劲头。宋教仁鉴于黄花岗起义的教训，强调下次起义非切实准备不可。于是，他们又重新考虑建立中部同盟会分会的事情。

组织中部同盟会分会的建议，源于宋教仁在 1910 年提出的著名的“革命三策”。这年，由于同盟会内部的整顿工作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东京总部一片涣散，在南方边远省区发动与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又无法取得胜利，部分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对以往采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性也发生怀疑。这年秋天，谭人凤和赵声商量后，召集了张懋隆、林时爽、李伯中、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和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的寓所寒香园开会，讨论关于革命组织与方略的一些设想。会议推谭人凤为召集人，邀请在日本的 11 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在陈犹龙寓所召开大会。会上着重讨论了革命中心的转移和革命进行的步骤问题。

宋教仁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总结了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对以后的斗争方略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建议，即革命三策。他指出，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攻占北京，摧毁清廷心脏，然后号令全国，就像已经获得胜利的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一样，是三策中最好的上策。中策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武装暴动，先建立政府，然后兴兵北伐。下策是在边远的地区设立革命机关，徐图进取。至于地方，可以挑选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当时与会者都认为上策运动比较困难，下策则实践已证明为失败，并且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不如取中策。鉴于同盟会东京本部已经不能对国内革命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会议根据同盟会初成立时关于在国内设立 5 个支部的决议，决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沿江地区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但当时因为经费缺乏和情况的变化而暂时被搁置起来。

此时旧事重提适是时候，经过几次磋商，7 月 31 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与会者 29 人。谭人凤在成立宣言中写道：“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说明了它和同盟会的关系。宋教仁在章程中说：“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揭示了该会宗旨。会议决定设会长一席，暂

时虚席以待，将来由选举产生；全会的事务由总务干事集体议决。总务干事设5名：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补生、潘祖彝。宋教仁分掌文事部，负责管理参谋、文案、编辑及其他各事，实际上成为中部同盟会的首要人物。

中部同盟会成立以后，宋教仁精心擘画，以为湖北居中国之中部，影响四及，地理重要理当在武昌首义。但武昌属四战之地，周围没有屏障，粮饷也不能接济，所以又计划一等湖北起义，同时即命令湖南、四川同时响应，以解救上游之困，作湖北起义军的后援。又计划于武昌起义之后，即派兵扼断京汉铁路，驻守武胜关，使敌人不能够增兵南下，这样使战火不涉及武汉，避免给帝国主义造成出兵干涉的口实。而山西、陕西后继起义，分散清兵力量，减轻湖北的压力。长江下游地区，则计划在南京同时起义，封锁住江口、海口，使敌人舰队孤立，而乘机袭取。与之同时，保证长江航运的通畅，不影响经济。宋教仁的计划非常周密。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计划，中部同盟会确定了在湖北省城首先发动，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在长江沿岸各省进行了周密的布置，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等人一起组织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丞赴安庆，设法筹组安徽分会；谭人凤前往起义的重点区域湖北省，策划具体的行动；居正到武汉，负责调解武汉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关系，谋求成立湖北分会。上海总机关统一指挥，运动沿流各新军的活动，也都按宋教仁的计划行事。他又命令刚从东京回沪的吴玉章、张懋龙回四川后即刻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各省分会遥相呼应。井勿幕在陕西宣传革命颇具实效，宋教仁请他与南方各省到时一致行动。此外，江西、南京和长江口地区，也同样作了适当的安排。这样一来，长江一带革命力量首尾呼应，起义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宋教仁又致力筹款、购械，力求谋定而动，一举成功。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六、革命爆发与争取革命领导权

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先是在1911年的5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首先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又与英、法、德、美4国银团签订借款合同，将这两条干线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4国。湖南绅商学工各界首先起来反对，接着湖北、广东、四川纷纷响应，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6月，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宣布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并联络各省，赴京请愿。各府州县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8月，成都全城罢市。9月，发展成为全省范围的拒缴厘金杂税的斗争。9月7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20余人，制造了成都血案，立宪派的“文明争路”主张也告破产。全川人民怒不可遏，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20余万人进围成都。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荣县宣布独立，建立全国第一个革命的县政权。清政府急令督办两路大臣端方自湖北调军入川镇压。清军西调，武昌地区兵力空虚，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宋教仁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广泛收集四川的消息，在舆论上给四川保路运动以有力的声援。9月中旬，他撰写了《论川人争路事》一文，希望

四川人民万众一心，坚持不懈，以暴抗暴，把斗争进行到最后取得胜利。此时，他已预感到革命行将爆发，他对革命的具体步骤，也考虑得一天比一天具体。9月2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了战略战术主张：一、不作持久的战争，速战速决。二、策反旧政府武装，使之成为革命所用。

保路运动发动以后，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加紧了策动起义的工作。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演变而来的，1911年成立于武昌，领导人是同盟会员蒋翊武、刘复基等。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些会员于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领导人是刘公、孙武等。这两个团体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吸收了士兵和下级官佐约五六千人参加，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3。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负责人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议下，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起义计划，组成统一的领导机构。蒋翊武任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为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主持大局。

居正、杨玉如在9月25日到达上海。当时黄兴远在香港，近日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在虹口筱崎医院，活动也不方便，只有宋教仁一人可以自由行动。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在近期内不能发难。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和密友，他的信，使宋教仁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疑问，去武汉的决心发生了动摇。正巧于右任这时离沪未归，《民立报》无人照管，宋教仁趁势延搁行程，一拖再拖，直至于右任回来，他却又生了病，无法赴鄂。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共进会机关赶制炸弹，因失慎爆炸受伤。起义机关暴露，准备起义时用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悉数被闻声赶来的俄国巡警搜去。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闭城搜捕。当晚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也遭破坏。蒋翊武机智脱险，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3人被捕遇害。革命党人从武汉给宋教仁致电，告知事情败露。宋教仁一直守在《民立报》社的电台旁，接到这封电报，如五雷击顶，面色焦黄。谁料第二天晚，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在失去领导人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第一枪，起义士兵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标营士兵积极响应，齐集楚望台，推举日知会会员、新军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经过一夜血战，占领总督衙门，瑞澂逃跑，武昌首义胜利。当夜一封电报飞到上海。宋教仁、于右任都在，电文译出，宋教仁高兴得大叫一声，从病榻上翻身而起，病也竟然痊愈了。

起义的胜利使宋教仁感到非常兴奋。他通过发表文章和拍发私人电报，积极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大力宣传革命的宗旨，以稳定市场和广大百姓的情绪，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但是，由于起义当时黄兴、宋教仁尚未赶到，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又都失去了联络，起义军骨干当场推新军第21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民政部长，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旧官僚和旧军阀。首义地区革命领导权的旁落，又使宋教仁感到悔恨不已。他认为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于是他竭力设法挽救，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10月24日，黄兴接他的电报后从香港回到上海。他从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出发，劝黄兴赴南京领导已经布置就绪的第九镇新军起义，攻取南京和东南各省，形成与武汉并列的局势，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

但黄兴认为此时以鄂事最为重要，反而拖他一起西上武汉。两人一夜未眠。第二天，宋教仁与组织南京起义的革命同志匆匆告别，决定到武汉以后见机行事。

到了武汉，宋教仁联系部分湖北革命党人一起策划，由居正出面提议，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以吴兆麟为首的部分参加首义者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反怪宋教仁多事，坚决反对。这件事没有成功，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民军总司令，渡江到前线指挥同清军的作战。宋教仁则被派去协助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办理外交，没有得到任何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的努力，没有被大多数人，包括黄兴在内，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但挫折没有磨损宋教仁的锐气，他仍尽职尽责，积极地从事外交的斗争。11月10日，袁世凯派蔡廷干和刘承恩来武汉议和，开出4个条件：一、清帝下罪己诏。二、实行君主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企图蒙骗革命党人的斗争。宋教仁都一一予以驳斥，当场严辞拒绝。他没有被袁世凯的阴谋诡计所迷惑，指出袁世凯阳为议和，阴为添兵之计，强调革命党人必须联兵北伐，彻底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

在办理外交期间，宋教仁还参与地方革命政权的组织和建设工作。他和孙武、刘公、张知本等一起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选举投票及被投票选举之权”，可以享受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保有财产以及营业的自由等。对于各种官职的设置与官吏的任免，他们都根据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为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拟就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组织方案，并为后来的《临时约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蓝本。

宋教仁在鄂期间，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政权已摇摇欲坠。11月3日、4日两天，上海和浙江也先后独立。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8日，原驻南京的第九镇革命官兵，进攻南京雨花台，失利后退往镇江。以沪军都督陈其美为首的中部同盟会在得到第九镇新军进攻雨花台失利的消息后，认为南京是战场上的要地，势所必争，非攻取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革命的任务，便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策动江浙各军编组联军，作为再次进攻南京的基本武装力量，并且还通电已光复各省，速派援军。与此同时，筹划成立中央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革命形势，正如宋教仁的计划所料。在武汉，宋教仁清醒地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革命党人全都处在黎元洪的指挥之下。他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感到再在武昌呆下去已无可作为，不如回上海组织全国临时政府，重新成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正巧南京的革命党特使倪铁僧此时来找他，请他回去调和各方进攻南京的武装之间的关系。于是，他留了一封短笺给黄兴，自己和日本友人北一辉一起乘坐一条小船，冒着两军激烈对射的炮火，穿越大雨中的江面，登上日轮“大利丸”号，顺流东下。

此时，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7日，黎元洪首先发出通电，向已经起义或独立的各省征询组织中央政府的意见。两天后，他又致电各省都督府，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筹商成立中央临时政府问题。但是，因为时局动荡，通讯线路受阻，黎元洪的电报东南各省并没有收悉。所以从11月11日起，浙江、江苏和上海的3个都督又连续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沪开会议建临时政府。多数省区的代表很快到达上海，并于14

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认为上海交通方便，会所设在上海最为适宜。

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竭力宣传自己的思想，推行自己的主张。他明确表示，袁世凯“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决不能同袁世凯进行议和，对清朝政权更不可抱有幻想。他同陈其美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认为只有迅速夺取南京，成立以革命党人为首的中央临时政府，才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当务之急。

黎元洪想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捞取中央政府领导大权的得力工具，因而一再坚持要把会所设在武昌，并派居正和陶凤集到上海，要各省代表刻期赴鄂。经过代表大会讨论议决，各省代表于28日分批西上，每省只留一个代表在沪，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宋教仁对此大为不满，所以在汉阳告失以后，他马上以各省留沪代表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要求各省代表立即折回。他认为，汉阳之所以失守，主要是因为事权和军令的不相统一。同时致电黄兴，希望黄兴坚持留在武昌，不要轻易放弃对湖北军队的领导权。当他得知黄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已经动身回沪时，他甚觉不安，一夜没有睡觉。他对北一辉说：“您不下围棋，可知道走错了一子，会使全局变输。黄兴败走使我陷于绝境。我考虑到天亮，觉得恢复局势的办法，只有赶快拿下南京。我在武昌担忧的事果然出现了。”

12月2日，江浙联军一举攻克了南京，这不仅稳定了东南各省的局势，提高了长江下游地区革命党人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汉阳失守以后革命军和清军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双方重新形成对峙局面。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一致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都要到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只要有10个省以上的代表参加，选举即可进行。宋教仁显得特别兴奋，在南京宣告光复的当天，他就同黄兴与章太炎联名打电报给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和镇军都督林述庆，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高呼“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第二天晚上，他又和于右任等人一起赶到南京。

为了巩固东南各省的胜利成果，使中央临时政府有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宋教仁十分注意江苏都督的人选，通过对封建官僚程德全的有限妥协，为中央临时政府设于南京铺平了道路。而如何把中央临时政府的领导大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就成了他下一步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为此，他和陈其美一道，根据北一辉的建议，于12月4日，在上海策动各省留沪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组织以黄兴为首的中央临时政府，而让黎元洪任副元帅，兼鄂军都督，继续留在武汉督师。由于袁世凯已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所以由鄂转宁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决定暂缓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承认上海推举的大元帅和副元帅为有效，并在各省赴鄂代表讨论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黄兴力辞不受，推荐黎元洪或尚在国外的孙中山担任此职，后经代表们一再恳求，才表示同意暂时勉任。可是，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却大加反对，来电竟谓：“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从日本返回未久的章太炎也发表声明，大发议论，主张以武昌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推举黎元洪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让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而黄兴则只能等待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样一来，不仅使黄兴的处境十分尴尬，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宋教仁是否想独揽中央政府领导大权产生怀疑。但是，宋教仁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他仍充满信心地发挥其天赋的

组织才能，动员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于武昌，由黄兴担任副元帅，到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代行大元帅职权。黎元洪对此十分满意，来电声称“姑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元帅执行大元帅一切任务”。黄兴虽然又再三推让，但最后也答应了下来。至此，宋教仁终于把黎元洪的革命领导权悄悄地夺到了革命党手中。

但是，大元帅和副元帅的推定，并没有满足宋教仁的心愿。他很快就发现，大元帅和副元帅只能作为军事上的最高统帅，而不能被人们看成是中央临时政府的首脑，要组织中央临时政府，就必须推举临时大总统。而这时候，袁世凯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同革命军方面进行交涉，企图捞取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同时他还秘密派人到南京，多方活动，怂恿人们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致使一些本来就立场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尤其是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马相伯，感到革命军方面没有斗志，推举袁世凯是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利用自己是江苏都督府代表的身分，游说程德全，汤寿潜和陈其美。宋教仁知道以后大为愤慨，他亲自跑到各省都督府代表住处，对那些不坚定分子做说服工作。他认为，在党内深孚众望的只有黄兴，所以他急召黄兴赴南京，打算等黄兴一到，就马上选举黄兴为临时大总统，让黎元洪专管军事，隶属于临时大总统。

七、为革命忍辱负重

正当宋教仁为挫败袁世凯的阴谋而努力的时候，孙中山回国了。他的到来使革命党人等来了自己当然的领袖，使袁世凯的阴谋活动归于东流。

黄兴本来也想早日赴南京就职，他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为到南京的军政开支。但是12月23日，他接到孙中山的一封电报，知道孙中山正在归国途中，不日即可到达上海。他考虑到，若不等待孙中山，抢先一步到南京赴任，不仅会使孙中山感到不快，而且还会使党内同志产生怀疑，影响内部团结，对革命不利。因此，他毅然决定暂不启程，等孙中山来到以后再作打算。

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回到上海。在回答中外记者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他公开宣布：“我不名一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革命的目的不达到，没有和议可谈的。”并且指出：“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然而来日困难尤胜于昔。今日我同志不是用一种真精神、真力量与这困难交战，则过去的辛劳将归于无效。”这铿锵有力的语言，既表明了他自己的革命决心，对广大革命党人也是极大鼓舞。

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到来，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当北一辉于当天晚上从上海赶到南京去劝说他拥护孙中山时，他气得满脸通红。他对北一辉说：“老兄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这时张继也特地赶来对他进行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于第二天赶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借哈同花园举行的欢迎孙中山的宴会。

这天晚上，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孙中山的寓邸举行会议，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问题。面对时局，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权组织的具体形式上，与孙中山有分歧，与会者多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

制，他却坚持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于是议定以孙中山为大总统，以黄兴为内阁总理，而以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体制确定以后，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回到住所，他把北一辉从梦中叫醒，坐在北一辉的床边，不无歉意地说道：“今天早晨在南京对您发脾气，非常失礼。孙先生实际是个好人，我过去在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有利。孙先生担任大总统后成为革命的中心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握政治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一。这样大家都能各得其所。这是我和孙先生今晚商量好的。”

12月27日，宋教仁和黄兴同赴南京，将中央临时政府组织方案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讨论议决。由于代表们都不知道同盟会在上海作出的决定，结果宋教仁的内阁制又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以大局为重，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12月28日，他在南京宴请各省都督府代表，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主导思想。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附和着他的意见的人甚为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宋教仁的修正案才获得通过。但仅仅过了3天，又被推翻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专车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着手组织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宋教仁提出初建政府，须全用革命党的意见。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则考虑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如吸收一些有影响的旧官僚，而采取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为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孙中山初步拟定了9个部的总长名单，其中由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

1月3日，当孙中山亲临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宣布国务员名单，征询代表们意见的时候，王宠惠等8个总长均为大多数代表所通过，唯独宣布宋教仁的名字时，会场上突然引起骚乱。有人跳到桌子上叫喊，有人举起手枪示威，有人怒骂宋教仁是“专制家”，还说曾经看见前清官吏在他家里住过，证明他已经“背叛”了共和制。还有人大声指责说，宋教仁家居住的房子就是满族人的，所以他一定是反满革命的“叛徒”。这些代表居然捕风捉影，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宋教仁的头上，其声势之大，来势之猛，连孙中山和黄兴都抵挡不住，最后只好取消对宋教仁的提名，而由程德全担任内务总长。

宋教仁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固然有旧官僚、旧军阀争权夺利的因素在内，而一些革命党人，也对他有很大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起因于《民立报》发表了要修改约法的意见。在宋教仁离开湖北回到上海《民立报》社后，“临时约法”的稿本也通过邮局寄到了报社。《民立报》在刊登约法的内容之前，于右任先看了一遍，认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政府出现在世界上，必须力求完备，但这次湖北方面讨论决定的约法，有颇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在发表前，于右任商请宋教仁加了一段按语，说明这是草案，以后还会按公意修改。这则按语一经同时刊登，反对宋教仁的意见大起。章太炎又正好在《神州报》上宣称“钝初有总理之才”，反对者越加认为宋教仁想为自己谋权，其实都误会了宋教仁，错看了宋教仁。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可说是出力最多，最为忙碌的人。为了使革命大权不致旁落，以便把革命继续深入下去，他东奔西走，费尽心机。然而，出力者反得其咎，他的良好愿望和辛勤劳作，不但没有得到各省多数代表的体谅与慰藉，反而给自己招来了嫉妒和诽谤，到头来竟莫名其妙地被逐出临时政府的大门之外。直到1月15日，他才被孙中山任命为低一档的负责官长：总统府内的法制院总裁。于右任不无内疚地叹息道：“先生当此时代，虽有精锐的眼光，而不能运其敏活的手段，尽因此也。”但宋教仁笑着接受了孙中山的任命，发愤致力于法制建设，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于右任说他是“劳苦万状”，每天起早贪黑，连饭都顾不得吃。在很短的时间里，宋教仁拟订出《法制院官职令草案》、《中华民国内务官职令》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等有关政府官职的法令草案，使政府的一些部门分职设官有章可循，为实行民主与法制作出了贡献。正如蔡元培所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定也。”但当时还是有谣言，盛传他享乐女色，将纳名妓苏映雪，使宋教仁身边的人哭笑不得。

2月，孙中山决定重新制订约法，宋教仁作为法制院总裁，有起草的权力和责任，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他坚请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于1月28日组成的临时参议院自行组织起草委员会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些还在嫉恨他的权位的人就失去了造谣中伤的借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宋教仁和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确实有相当大的分歧。他想要在桌面上与之讨论，以示无私。在孙中山召集参议院的同盟会议员对约法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与胡汉民在中央和地方的建制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坚决主张中央集权，而胡汉民则主张地方分权。他说：“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虚置，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而且必中央有大权，而国力才可以复振。日本倒幕，是我前师。”胡汉民则说：“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致有中央有权无责，地方有责无权之讥。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为比。美国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法国集权，而黠者把持，再三篡夺。我宜何去何从？况中国革命不及于首都，当权者脑中惟有千百年专制经验，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被推翻，何望富强？”宋教仁又说：“君不过怀疑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权力极小，虽有野心，亦不得不就范。”胡汉民再次辩驳道：“内阁制仅依靠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反抗，后将无极。”然而，宋教仁并没有被说服。在建都的地点问题上，宋教仁也与孙中山、黄兴的意见不一致。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了。清室在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孙中山在第二天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但却提出了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想以此来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2月18日，孙中山特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狡猾的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且给予热情招待，一本正经地表示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暗中却密令手下制造假兵变，扰乱市场，在北京东城及前门一带肆行焚掠，并冲入迎袁专使的住处，将行李和文件等物洗劫一空。京、津、保三地的商务总会

见此情形，齐声叫苦，要求袁世凯留京以维持安定。袁又指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制造临时政府定都北京的假民意。各国驻华公使则以保护使馆安全为由，先后从各地调集军队。一时北京地区形势搞得十分紧张。北京百姓一日数惊，人心惶惶。袁世凯即以此为借口留京不走，说“南下就职暂难办到。”蔡元培没有识破袁的诡计，便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一切。

宋教仁对袁世凯没有任何好感。混乱发生时，他从迎袁专使住处的后院逃出，路遇一个日本人，以为宋也是日本人，听说他要避难，就请他到自己的住处过了一宿。吃饭时，日本人还一个劲问他怎么和宋教仁那么像。宋教仁只好支吾其词，第二天迁往六国饭店，同蔡元培等人碰头。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次兵变的内幕，但已猜测出其中的隐情一定是个阴谋。然而，也许是因为他主张把首都立于北京的缘故，当他在3月9日接待《民立报》记者采访时，并没有提到他的这种猜测。由于他在北京时交际很广，与袁世凯等各派势力都有密切的接触，马君武对他有很多诋毁，说他卖党与袁世凯。他回到南京听说后，怒不可遏，在总统府抓住马君武质问，气急地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当即还击，打伤了素来体弱的宋教仁的眼睛。黄兴急忙赶来劝开，把宋教仁送入医院。过了十几天，他才痊愈出院。事后了解情况的人都责怪马君武卤莽。马君武这才感到非常惭愧，对别人说：“因不识钝初的政治手腕，才这么说的。只要钝初真心为党，我可以当面向他道歉。”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孙中山提出的三个条件已经有两条失效，但他仍对第三条抱有希望。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制订了1部包含7章56条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正式公布。这部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内阁向国会负责，全体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构，行使行政职权。因为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实际作用，早已被否决的宋教仁的意见，在这部约法里重新得到肯定，政权的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八、组织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

袁世凯篡夺大总统权位以后，迫于革命力量的压力，违心地按照约法的规定任命了首届责任内阁。在南北和谈中对和平有贡献的北方代表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负责在北京组阁。宋教仁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农林总长，与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同加入第一届责任内阁。宋教仁一向致力于研究政法组织，已经享有盛名，袁世凯却委任他管理农林，不过是搪塞同盟会分享胜利成果的要求而已。袁世凯的诡计，宋教仁是知道的，但他认为，成为阁员以后，不管怎么说总是制订大方针政策的人中的一员，对实施自己的政见有便利的地方，于是姑且受职。4月20日，他和蔡元培一起连袂北上赴任。

在农林总长任上，宋教仁保持了他一贯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制定了大量的积极政策。他打算设立有关学校和教育机关，建立实验场，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他深深感到，中国的财政力量薄弱，农民缺乏生产资金，所以他又想建立拓殖金融机关和劝农金融机关，以便给农民发放贷款。同时他也主张酌量输入外资，作为对农业生产资金的补充。除此之外，他还拟订了边

境开垦、移民与植林等法律草案，计划在东北等地设置垦殖机关，对于当时的其他内政与外交，他同样提出过积极的意见。唐绍仪十分欣赏宋教仁的才识，有事总喜欢同他商量。很快地，宋教仁就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林总长的范围，人们都称这届内阁为“唐宋内阁”。

6月，袁世凯自感位置已经坐稳，即无理地剥夺责任内阁的权力。唐绍仪无法忍受袁世凯的逼迫和打击，于6月17日留下一道辞呈，愤然离京赴津。为了表示对唐的支持，宋教仁也拒绝了袁世凯的一再挽留，于7月8日提出辞呈。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实际上已经充分说明，无论是临时约法，还是责任内阁，都不能对袁世凯起到任何限制作用。要对付袁世凯，只有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首先在战场上打败袁世凯。但是唐内阁的垮台，没有影响宋教仁对责任内阁制的信心。他认为唐内阁的垮台原因是因为意见不能一致，不能显示责任内阁的巨大威力，于是他谋求建立由一个政党组成的纯粹政党内阁。宋教仁以西方英、美两国的议会政治为蓝本，认为要组成纯粹的政党责任内阁，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强大政党才能成功。特别是黄兴被迫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遣散军队和唐绍仪内阁垮台以后，同盟会由于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连续受挫，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这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在将来的正式国会里造成强大声势，是革命党人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一大关键。

这时候，章士钊在上海《民立报》发表文章，宣扬“毁党造党”之说，主张将所有政党尽行毁弃，然后经过研究，求出一个大同大异之点来，组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政党，作为实现纯粹政党内阁的良好基础。这一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完全符合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于是他便施展自己丰富的政治学识和机敏的外交技巧，在政党林立的情况下，开始组党建党工作。

正当宋教仁为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而努力奔波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不顾临时参议院的多次反对，硬要碌碌无能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继唐绍仪之后出任内阁总理，并依据自己的意愿组织内阁，损害了不少党派的利益。本来不同意同盟会意见，想参加陆征祥内阁的统一共和党，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想设法把陆征祥推翻，结果不仅不能如愿，而且还遭到共和党和军警界的嘲弄和诽谤。统一共和党的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与同盟会携手，共同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

8月5日，双方代表就新党的名称、纲领以及组织等问题开始在北京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一同合并，先后派代表前来参加，使合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5个政党的代表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以“国民党”作为新党的名称，并且拟订了保持政治统一等5条纲领。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召开职员会议，宋教仁汇报了5方谈判的基本情况，在到会的70多个同盟会领导中，只有5人表示反对，其他全部投票予以通过。其他4党的代表也都回去报告本党，都得到了各自政党的同意。

8月25日，国民党借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并发表了关于民生主义的长篇演说。会上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蒋翊武等29人为参议，另外还有7名名誉理事和300多名各部的干事。随后，黄兴和宋教仁等7名理事又共推孙中山为理事

长，旋因孙中山忙于他事，党务无暇顾及，便委托宋教仁代理。

国民党的建成，使宋教仁感到十分得意。他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写信给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然后，随着正式国会竞选的开始，他又积极地投入竞选斗争中。

从1913年1月开始，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他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很清楚地了解到，要使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担任一个并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应有作用。因此，当他在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十分明白地说道：“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的党员选你当总统”。他想通过这条途径，把袁世凯踢出中央政府的大门以外。这个消息很快透露了出去，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2月18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对此作了公开的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若是实现，对袁世凯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进、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宋教仁的这个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袁世凯下决心杀害宋教仁了。

九、为革命理想而牺牲

袁世凯早在“间岛事件”时已经听说了宋教仁的才华，也亲眼见识了他的文章，送过他1000元钱，自以为是慧眼的伯乐，宋教仁理应感激他。在北京期间，他再一次看出宋教仁的雄才和魄力，几次想收买他，并亲自约见，送他价值3000元的全套西装，连尺寸都是事先调查好了的，刚好合身。听说他将南下，又赠支票一张，计洋50万元。宋教仁不动声色，直到第二天，写了一封信，派一个可靠的人送呈袁世凯。信里说：“绋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50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还，伏祈鉴原。”袁世凯接信后说：“他藐视我了。他显然在表示要和我做对头。”国民党竞选的胜利，宋教仁谋选黎元洪为总统的消息，使袁世凯非常惊慌，他阴谋杀害宋教仁的罪恶计划要付诸实施了。

袁世凯的喽罗们一直追踪着宋教仁的行程，宋教仁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袁世凯的眼睛。所以当宋教仁在上海兴致勃勃，信心十足，为其即将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作全面准备的时候，袁世凯则在北京为暗杀他而进行精心布置。3月19日，袁世凯向上海负责暗杀的凶手下达了“事速进行”的命令。于此同时，袁又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商讨国事。

宋教仁不知道其中的杀机，便于3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这天晚上，他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朋友们辞行话别。他的好友徐血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却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回答：“无妨。我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险，仍当全力以赴。”

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走出上海火车站议员休

息室，准备上车。他们刚刚走到检票口，只听得一声低沉的枪响，随后又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跌倒在铁栅栏上，低声说：“我中枪矣。”脸色异常地痛苦。

宋教仁被送进附近的铁路医院，因伤势很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便把老友于右任的头抚在自己胸上，以三事相嘱：一、将书籍赠南京图书馆；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图事，复兴民族。22日凌晨，这个有抱负的堂堂正正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年仅31岁。虽然国民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发动了“二次革命”，兴兵讨伐袁世凯，但是不久也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教仁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中寻找思想武器，希望使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繁荣昌盛。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无法懂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已经过时，整个时代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宋教仁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向中国人民证明：资产阶级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探求新的途径，即必须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